

1930-1950年代香港基礎教育的發展與挑戰：中文剪報鉤沉

麥肖玲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方駿

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歷史系

過往人們研究香港的教育發展，多從官方資料入手。官方資料雖然重要，但畢竟只是歷史建構的多種根據之一，只能提供一個角度。另外，1974年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香港官方的資料單以英文表述，反映了英文所負載的利益和觀點。本文嘗試從民間和中文的角度去建構1930-1950年代香港教育的發展，透過對中文報章資料的系統分析，探討了這時期香港教育量的發展、公私營學校的消長、質的改善、教育機會與甄選、學生的精神面貌等方面的情況，揭示了少為官方資料所反映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相信對更清晰地瞭解這一時期香港教育發展的來龍去脈，具有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基礎教育、教育史、教育本土觀

前言

過去人們研究香港的教育發展，多從官方資料入手。這些資料包括政府年度報告和政策報告書。前者記錄了香港歷年的教育概況，如學校類別、學校數、學生數、經費等具體而系統的第一手資料。現存最早的政府報告可追溯到1871年。後者是政府考慮是否推展新政策之前所做的顧問報告，對當時的有關教育範疇作較深入的分析，很有參考價值。阮柔（1948）、方美賢（1975）是典型的參考官方資料的著作。英文著述方面，Eitel（1890-1891）編寫了19世紀的香港教育史。Bickley（2002）的研究，輯錄了1841-1897年間香港官方的教育報告。

歷史事件（event）發生之後，後人只能根據有關的記載去瞭解它。每一事件都有不同的受眾、角度與資料，建構成瞭解過去的不同根據（evidence）（Stanford, 1986）。官方資料雖然重要，畢竟只是歷史建構的多種根據之一（Carr, 1961），只能提供一個角度。例如，從官方資料我們可以知道某一政策的實施，卻難以知道社會各界是否接受、如不接受又怎樣抗拒。政策從制訂到實踐是否順利、修訂的過程如何等等，都不是單一的根據所能充分解答的。要得到較為全面的認識，我們需要多渠道、多類型的根據。歷史觀點的幅度有賴於過去的聲音的幅度；多元的聲音才能構成多元的觀點。這些聲音有不同的形式，常見的是口述歷史（Thompson, 1978），也可以透過文字，如回憶錄、校史等形式出現。簡言之，官方資料代表了教育的主要持分者的聲音，是研究教育發展的重要資料，但不是唯一的。

王齊樂（1996）和Sweeting（1990, 2004）所收的除了官方記錄之外，還有校史、社團記錄、報刊、學者論著等資料。其論著一方面豐富了歷史研究的根據，另一方面可以比照事實與看法（fact and opinion）¹（Sweeting, 1990），將一元化的歷史建構擴展為二元化。此外，由於教育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環節，很多記載香港社會發展的文獻都有相關的討論，如魯言（1979）、李志剛（1992），但教育卻不是其審視的主體。

近年與香港教育史有關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逐漸多元化，既可作為獨立的作品，又可聚合而成為一種門派。例如，蔡寶瓊與江瓊珠（1998）、陸鴻基（2003）、張慧真與孔強生（2005）等從貼近社會生活的角度去重新建構香港教育史的某個側面、社群或年代，與從官方角度建構的歷史形成了對照和互相完善。歷史事件畢竟因人而出現（Carr, 1961），近年的香港教育史研究正好說明個人的經歷與聲音構成了我們瞭解過去的重要途徑。此外，香港的學校記載，如校刊、校報、校史等（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2000; Queen's College, 1992），以及一些教育家或其後人的回憶錄（陳謙，1992; Hinton, 2004; Symons, 1996; Yu, 1999），都為香港教育發展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

像很多學者一樣，本文作者從事香港教育史的研究，也從官方資料開始。可是，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出現一些問號：教育政策與實踐之間有什麼聯繫？官方與民間的觀點或利益有何異同？當雙方有利益衝突時，會帶來怎樣的互動？教育的受眾（家長、學生、教師等）作為持分者，如何接受、抗拒或者改變教育政策呢？同樣重要的是，語文作為論述歷史事件和根據的載體，是帶有價值和利益立場的。早期官方的資料以英文表述，反映了英文所載負的利益和觀點。那麼，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有什麼看法呢？這些問題促使我們尋找官方和英文以外的歷史根據。但是早期香港教育的民間和中文的資料，整理和編纂工作做得不多，使人難以瞭解到當年的情形。因此，我們嘗試有系統地梳理早期香港中文報紙有關教育方面的報道，從民間和中文的角度去建構香港教育的發展（方駿、麥肖玲、熊賢君，2006）。Tosh (2002, pp. 63-64) 指出在英國的歷史研究，報紙是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原因之一是報紙捕捉了當時主要的政治和社會觀點。香港政府的教育年報主要總結當年的概況，是靜態的，範圍以官津補校為主。報紙每天報導，有官方發放的資料，更有較為動態，呈現多元化的社會視角，尤其是教育界及家長對學校質素、社會風氣、師德、學生行為等方面的訴求，對官方資料作了必要的補白。

香港在1841年開埠以後約一百年間，政府沒有承擔主要的辦學任務。香港的學校只有少數是官辦的，其餘都是教會、社團或私人所辦。1950年代初內地政局轉變，大量移民湧進本港。直到1953年12月石硤尾大火之後，政府才正視從內地遷港的人口會長期留居香港的事實，開始作長遠的規劃，大量增建小學，增加對教育的承擔，教育亦開始從私營為主過渡到公營為主。1955年可說是香港教育發展的分水嶺，本文的討論以此為界，集中於1930–1950年代。內容方面，我們選了中小學教育。報紙報導其實包括教育的各方面，不過，當時香港處於教育待興的階段，報導自然集中在中小學。「基礎教育」是一個當時不常用、而且褒貶不一的概念。²我們這裏採用的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基礎教育」的含義：在一個社會裏所有公民都有機會接受的教育（Guthrie, 2003, p. 2196）。基礎教育的年限是相對的。早期香港根本沒有全民教育這回事。1971年實施了六年義務教育，可說正式界定基礎教育為小學教育。1978年的九年義務教育政策，把基礎教育延伸到初中程度。隨著3+3+4學制於2009年實施，進一步擴充高中學額，基礎教育也等於相應延伸到高中程度。因此，本文也是香港基礎教育發展過程的探討。

1930–1950代的香港教育除了本土因素之外，抗日及國共內戰都導致香港及內地的人口往返流通，造成了百花齊放、良莠共存的局面。這二十多年可算是香港教育的躁動期，為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我們從當年豐富的報章資料中，梳理出幾條主線，包括量的發展、公私營學校的消長、質素的追求、教育機會與甄選、學生的精神面貌等。這些教育的主線又與整體的社會環境，如人口、經濟及人們刻苦奮鬥的精神，互相交織。這些資料既有宏觀的，也有微細而充滿生活氣息的。這些一手資料讓我們可以作直接的檢視，找出在本港的教育發展歷程中，哪些方面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哪些方面是恆久的矛盾，表徵不同，實質卻揮之不去。我們從這些資料可以比較香港教育發展過程中的變遷與延續。下面我們從五個方面討論這些主線。在適當的地方會引錄一些統計數字，作為背景。這些數字源自政府報告，一般人很少閱讀。報紙則是向大眾公布政府資料的有效渠道。

量的發展

數十年來的香港教育發展，可以說是學額的供與求之間的一段長期競賽。抗戰初期不少內地人士避居香港，因而對學校的需求以倍數上升。以下的報導，對1930年代末學校數目的迅速增長以及許多學校簡陋的辦學條件作了很生動的描述：

學校林立，且為「雨後春筍」的勃發，你隨便走去本港各繁盛街道看看，除了海邊與電車路，哪一條沒有十間八間的華人學校，幾乎觸目皆是。各校的招牌，都粉飾得極堂皇。招牌儘管寫得怎麼好看，但進窺其內容，校舍往往一二層樓，教室、寢室、飯堂、辦公廳，都同在一處。校具簡陋，儀器標本更談不到，設備不計他妥不妥當，只求招得學生，就大吹大擂——什麼書院或什麼學校，這種有名無實的學校，恐怕在本港最是司空見慣。（《南華日報》，1939年4月27日）

以上的微觀記錄，可輔以具體的數據。當年的報紙經常引述香港政府的年報。二戰結束後，香港鬧房屋荒和學校荒。1945年全港學生人數只有一萬三千，到了1947年超過九萬名。1949年之後，內地南下人口激增。在1945與1954年之間，學生數目增加達十七倍之多（見表一）。但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卻是少數：1947年政府承認全港有五萬多名失學兒童；上中學的更少，平均每四名小學生之中，只有一人升讀中學（《華商報》，1947年1月11日；《華僑日報》，1950年4月24日）。

在多所私校請求政府放寬收生限制的情況下，教育當局於1949年6月向學校發出通知，暫時放寬教育則例有關每位學生所佔面積

表一 戰後香港學生人數

年份	學生數
1945	13,000
1946	60,000
1948	110,000
1952	190,000
1954	224,197

資料來源：《星島晚報》，1955年3月25日（轉引自當年政府年報）

不得低於10平方英尺的規定（《星島日報》，1949年7月2日），但這一措施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兒童失學的問題。這一時期的香港報章，不時可以看到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資、增建新校的呼籲，以及對政府教育投資不足的含蓄批評：

廣州的市立小學是百間以上的，我們敢要柳司（即教育司柳惠露——作者）多辦幾間小學。漢文中學也需多設一四間，或就英文書院中增建新校，設置中文部。……當前的公私各校設置上、中、下、夜和義學五班的數目是否太多，合不合理？是否容許太濃厚的商業色彩？」（《華僑日報》，1951年1月18-20日）

受英國國內工黨政府「教育機會均等」政策的影響，同時也為了平息香港社會各界對失學兒童數目眾多的不滿，自1954年起，教育當局落力推行擴展小學教育的計劃，小學校舍的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平均每17天就有一所新校舍落成。當局擴展校舍的計劃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47年全港共有600多所小學；到60年代數目躍升至1,600多間（陸鴻基，2003，頁113-114）。

公私營學校的消長

香港政府的一貫政策是只辦幾所官立學校，投入優秀的教師及充裕的資源，作為優質學校的榜樣；另一方面，鼓勵民間辦學，以應付社會大眾的需求。這樣，政府制訂教育則例，投資雖少，卻可控制學校的教學質素和內容。民間辦學包括教會辦的補助學校、津貼學校（即受政府資助的私校）及私校（沒有受政府資助）。官津補校學費低廉而質素高，可惜學額有限，家長只有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尋找其他學校。當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增加時，官津補校沒有相應的增加，回應社會需求的任務便落在私校身上。1929年在教育司署管轄下的學校的比例是：官校（2%），補助/津貼學校（33%），私校（65%）（Hong Kong Government, 1929, Appendix O）。抗戰初期，避居香港的人口劇增，私校數目亦大增。五十年代初，香港百業蕭條。

一方面家長失業者眾，部分子弟失學或轉讀學費較低的夜校；另一方面，教會辦學增加，致使私校的學生人數減少。即使如此，1954年私校生的人數仍然是官津補校生總和的雙倍（見表二）。隨著政府增加對教育的承擔，在七八十年代，私校逐漸淡出，被官津補校取代，如到1971年小學免費教育實施之時，私立小學學生只佔全體小學生總數的不足25%，1985年之後更降至一成左右；至於中學，1960年代，有近四分之三的中學生在私校就讀，1978年政府實施九年免費教育政策後，就讀私校的中學生人數及百分比逐年下降，至1996-1997年度，僅有12%的學生就讀私立中學（譚萬均，2000）。

表二 1954年學生數

學校類別	學生數
官立學校	17,852
補助學校	47,785
津貼學校	14,372
私立學校	144,188

資料來源：《星島晚報》1955年3月25日（轉引自當年政府年報）

私校在普及教育方面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然而，由於資源匱乏，質素參差，其中不少以牟利為目的。因此當時的報章報導較多著眼於光怪陸離的私校現象。當年的報刊常見報導的「僑校」，指的是那些自1928年以後為方便其學生回大陸升學而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註冊的香港私立學校。僑校常被批評收費高、校舍簡陋、教員待遇低，只能「吃不飽、餓不死」。在四十年代，僑校為保證收入，按學期收費，並且是收上期的。1948年教育司考慮到家長的負擔過重，下令僑校改為按月收學費，以減輕家長負擔。這樣一來學生流動性增加，影響了學校行政，更影響了收入。結果，僑校為保證收入而訂出不同的開課日期。例如政府規定暑假以42天為限，而暑假是不用交學費的，一些學校嫌暑假太久，紛紛提前在八月開課，多收一個月的學費。這樣又引起了家長的非議。經過各方集議，終於達至全年分十個月收費的辦法，七、八月不收學費（《星島日報》，1948年1月20日；1948年8月14日；1949年12月15日；《星島晚報》，1949年2月17日），此為現時香港學校一年只交十個月學費的起源。

當時許多私校質素低劣，為人所詬病，但他們亦有苦衷。例如1913年政府訂立教育則例，對於師資、校舍等都列明細則。這些細則其後經過數次修訂。戰後政府頒佈校舍的新規定，每間課室的高度、學生及教師所佔的人均空間均要達到最低的要求，以保持空氣流通、光線充足。如果私校嚴格遵從，每個課室的學生會減少二成左右，必致成本增加、營辦艱難。如前所述，許多私校紛紛向教育司申請從寬處理（《工商日報》，1946年6月18日；《星島日報》，1949年7月2日；1953年8月10日）。每次修訂教育則例，政府的年報都有記錄。但是則例的實施過程，卻不甚了了。報章在這方面的報導捕捉了官方與民間的互動關係，闡釋了從政策制訂到實施的複雜過程，把一元化的政府記錄呈現在真實而多角度的脈絡裡。

除了牟利的私校，當時亦有團體辦了不少義學，慈善家如胡文虎（1882-1954）或組織如鐘聲慈善社等，都參與辦學。另外，1946年港九二十餘個大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組織了勞工子弟學校，學生從最初的83人增加到1949年的二千餘人。這些學校艱苦經營，為貧窮家庭的子女提供基礎教育，其中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例如漁民深感子弟失學的苦痛，便同心協力籌備設校。以下是某漁校校董講述辦學的艱辛過程：

光復後，漁民從慘痛的生活磨煉中，感到漁民地位低落，都是由於教育落後，不願子女做大檔仔，於1945年大家自動組織起來，用漁民剩餘的軍票，換作港幣，充當開辦費，並由全體漁民同意，樂助千分之五的漁傭，最初只有三四十人，可是，過了幾個月，學生越來越多，學校經費已感不敷，便請教、漁兩司補助……。區區津貼還是不夠的，便發動募捐……。天氣非常冷，還下著細雨，但這群老漁民，毫不畏懼風雨，七十多歲的麥福華，他坐在船頭，忘記了風和雨，衣服都濕透了，但他一面推開擁擠的船，一面滑到其他的漁船去。就在這裏熱烈的募捐中，學校終於站起來了……。那年秋天，漁價低跌，漁民生活困難，學校窮得太厲害了，竟發不出教員的薪金，可是全體教員堅決的捱下去，有時伙食開不成了，校董便設法籌十元、二十元不等，給他們開飯。但沒有一個教員喊苦，反

而更用心教學，而至有今日的成績。（《星島日報》，1949年6月20日）

另一艱辛辦學的例子是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勞教會）在1946年成立。當時勞工子弟失學者眾，情況嚴重。港九工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發起組織勞教會。參加者有二十餘個大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並陸續開辦勞工子弟學校。不少十幾歲的孩子，日間工作，晚間上課。以下的報導記錄了當年學生的求學點滴。

在勞工子弟學校讀書的學生，大多數都是貧苦的工人子弟，他們一方面在饑餓線上掙扎，一方面埋頭讀書。由於這些貧苦學生空著肚子上課，因而在上課時由於饑餓而暈倒的事情也常有發生。為了照顧這些貧苦學生，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在去年五月舉辦了一次足球義賽。這次義賽得到了熱心的各界人士的支援，共籌得兩萬多元。因此，在勞校讀書的近三千個貧苦的工人子弟，從去年九月開始，就每天獲得一個麵包充饑，免於空著肚子上課了。一個麵包雖微，但對於經常陷於饑餓中的工人子弟，是實在有幫助的。據勞校的教師說，由於所有學生都免費獲得麵包充饑，所以學生餓極暈倒的事情很少發生了。（《文匯報》，1954年4月23日）

陸鴻基（2003）不止一次用「可歌可泣」來描述香港教育的發展。短短四字道盡了多少先輩的辛酸！這裏引述的只是無數故事之一二而已。當時的報章資料有不少這類的真實故事，除了作為史料，如實反映微觀的教育發展過程外，更喚醒我們的本土感情，讓我們瞭解先輩是怎樣熬過來的。

雖然勞校肩負起政府沒有承擔的責任，可是卻受到後者的挑剔。1949年教育司以校舍不符合規定為藉口，下令吊銷勞校執照。命令內容如下：

我要通知你，政府現想由1949年9月起，在彌敦道旺角政府學校校舍內舉辦上午及下午班。因此，沒可能讓你在下午利用這些校舍上

課……。政府學校將會儘先收容現在勞校的學生。（原有的勞校）校舍不會被容許用來當作學校……。學校的執照亦同時吊銷……。以上的學校都是設在令人不滿的校舍內。這些學校的學生被吸收入政府學校後，學校就會成為不需要了。

依據教育法例第17條的內容，關於取消以上學校註冊的決定，你有權可以向港督上訴。但上訴要在收到現在的通知一個月內進行，同時要符合教育法例第18條內的規定。（《華僑日報》，1949年6月10日）

這道命令引來很多家長的抗議，認為其真正動機是阻止被視為左派的勞校的政治影響。後來由於勞校的護校運動，教育司放棄了這道命令，卻作了另一宣佈：組織沒有勞校代表的委員會接管勞校。同時，教育司也下令改組勞校之一的漁民學校，由官方派校董接管（《文匯報》，1949年11月2日）。這種手段與五十多年後教統局以校本管理之名，削弱辦學團體影響力的手段何其神似！

質素的追求

如上所述，早期香港各類學校中，私校佔多數，但是質素參差。其中一種被稱為「走鬼學校」的私校，為了賺錢，罔顧教育當局對教師資歷和學生人數的規定，下面的一則報導為讀者提供了師生迴避視學官員的生動描述：

「走鬼學校」是學生要走鬼、教師也要走鬼的學校之謂也……儘管當局對於學校的設備、師資都限制得很嚴格，可是「走鬼學校」卻不理這些，他（校長）有自己的一套。比方教育司限定，一個課室只可容納學生三十人，以及要由註了冊的教員執教。但「走鬼學校」對於這些，就好像若無其事，招收學生是「多多益善」，而聘請教員，除了三兩位已是註了冊的之外，就不理資格如何，只要薪水少，授課的鐘點多，就「正合孤意」了。這樣，碰到教育司派視

學員來視學的時候，過額的學生要「走鬼」，沒有註冊的教員也要「走鬼」。因此，就成為「走鬼學校」了。

……做黑市學生也不好過，遇到視學員來了，學校老闆（這就是校長先生）一聲號令，他們就好像耗子碰到貓兒一樣，或者像一些敗兵遊勇似的，分頭躲避，「撤退」——躲進廁所，躲到屋頂去了。他們的狼狽情形，是使人覺得可憐而又可笑的。那些黑市教員，也毫無例外的夾在那些黑市學生之中，一同「走鬼」。倡導「師生打成一片」的新教育家，最好就是向那些「走鬼學校」的黑市教員「看齊」；因為他們確確實實是與學生打成一片的，當大家都需要「走鬼」的時候。（《星島晚報》，1949年7月8日）

由於學額供不應求，在四十年代已有同一校舍作上、下午校的做法。個別學校更實施一日四校制，即上午校、下午校、夜校，以及在下午校與夜校之間授課的下午特別班。應付校舍不足的另一做法是星期日上足10小時課，以物盡其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建立的學校逐漸增加，私校數目相對減少，一校四更的獨特做法才慢慢消失。

當時當務之急是解決量的問題，對改善質素的討論不多，即使有，也是關於校舍面積、衛生設備等基本問題。教育司署辦了一些在職教師課程，也只是很小規模而已。1951年教育司高詩雅履任伊始，提出三項教育措施：增設中小學、訓練教師及改善私校教員待遇（《華僑日報》，1951年1月18-20日）。他在1955年說：「毫無疑義地，戰後以來，教育的進度已經突飛猛進，我們正在試辦一些從前未有嘗試過的工作，我們正要增加一些新科目於課程上，並且提倡新的課外活動，同時我們準備向大量增加的學童，供應這一種較為完善的教育……。在今後七年內，將現有的小學學生人數增加一倍，而毫不降低教授的水準……。並非僅僅在乎盡量收容學生，而是給予學生們健全和平均發展的教育。這一種教育，是只有效率優良和心地良善的教師才能供應的。」（《星島日報》，1955年8月16日）。這些措施可說是制度性地對質素追求的開始。

教育機會與甄選

今天香港實施義務教育，所有適齡兒童都有入學機會。當年兒童能否入學，視乎以下的條件：家境、性別、城鄉差距，以及運氣。

無論哪一個年代，家境都是決定個人教育機會的最主要因素。家境好自然選擇多。家貧而幸運的可以上義學，又或申請減免學費。這方面報刊資料相當豐富。性別方面，從當時的政府記載可見重男輕女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報刊甚少提及，因為在那個年代這根本不是問題。另一個今天很少人會想到的不公現象是城鄉差距。當時香港尚有城鄉之分，新界的學生多為農村子弟。為了阻止村民湧到市區謀生，政府呼籲農村子弟畢業後接受技術訓練，成為好農民，不應嚮往都市的白領工作。這是壓抑農村子弟志向的一種隱性的甄選手段。幾十年前的元朗仍是農村，只有少數子弟有幸唸中學。1955年港督葛量洪在元朗公立中學頒獎禮上這樣說：

有些農人渴望一嘗城市生活，尋求白領階級工作，就一般而言，此是嚴重之錯誤。城市所產生之誘惑，吾人應予以抵抗。須知農人生活是良好之生活，亦是有酬報之生活，有時固然艱苦，但其他事業，亦何嘗不如是？農人子弟獲得事業成功之機會，在城市內遠較在農村中為少。因為彼等自幼即對農村土壤及農作物發生情感，此種情感，是永不磨滅者。反之，城市方面，人事陌生，成功機會自然較少，尤有家進者，農人於收穫時所得之快慰，實無與倫比，若以城市中書記員或店員之生活與之比較，誠不可以同日而語。固然，農人亦有失意之事，如天氣亢旱，以致禾稼失收等等。惟長久計算，為農人者實利多害少，且不患失業；反觀城市工作人員，如遇產業不景，則時有失業之虞……。余不欲君等存有鄉村兒童不應入校肄業之觀念。反之，彼等固應當受教育者，但當小學階段完結後，彼等大部分應受職業訓練，使成為良好之農民，而不應使彼輩追求有養成書記員或職員傾向之教育。當然，農家子女，其個性或有適合於教學或經商，或其他職業者，但此屬例外，不能作經常論。（《星島日報》，1955年2月11日）

這些資料說明香港雖然是城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跟其他發展中社會一樣經歷過城鄉差距的矛盾。

最後，運氣也很重要。當然，以上幾個因素其實都是運氣。但是，即使入學試合格，學額極之不足便要靠抽籤分配。1953年的《文匯報》記載，一位十二歲的小孩一直沒有入學的機會，經過入學試，成績雖然合格，若抽籤落空，便要耽擱一年才有書讀。可是那支獲得學額的籤卻給別人抽中了，他沒說一句話就放聲大哭，很多在旁邊看抽籤的工友都非常難過（《文匯報》，1953年8月23日）。

學校組織也有影響。例如在學制方面，香港原本實行4+8的學制，小學四年，中學八年。中學分兩階段，英文初中四年（第八級到第五級，Class 8-5），高中四年（第四級到第一級，Class 4-1），以第一級為最高。1951年學制改革為Form制，即六年小學、六年中學。中學分為初中、高中各三年。中學一年級為Form 1。新制的優點是推遲小學升中的選拔，也有較長的時間使小學教育更扎實（Hong Kong Government, 1952, pp. 23-25）。同期，教育司要求中文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參加會考，³小學亦有小六會考（《星島日報》，1951年6月16日、6月21日；《華僑日報》，1951年6月11日），以公開試的成績選拔學生，是我們今天依循的機制。不過，有些英文中學違背辦學規則，為了提高會考及大學入學試的成績，到中四便革退部分學生，留下好的學生；又或將學生分為升學班及就業班，美其名曰因材施教，實則擇優而教。這與今天部分學校的做法極為相似。

教學語言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沒有停過的爭議。英文學校畢業生出路遠勝中文學校畢業生，皇仁書院（前中央書院）學生未畢業便找到工作，即為一例。然而，英文學校比中文學校少得多。1952年官立英文小學招生額共四百名，報考者卻達一萬多人，可見競爭之激烈（《星島日報》，1952年8月18日）。

教育公平一方面與教育是否普及有關，另一方面視乎分配有限學額的手段。在五十年代我們開始見到一些推動教育公平的措施。1953年官立小學招考新生，「如果兩人分數相同，而一個家庭經濟情形比較差的話，那這個學生就有更多希望被錄取」（《大公報》，

1953年6月3日)。1955年官立小學招收一年級新生，四萬名申請者競爭一千名學額。教育官員稱：「過去取錄兒童，純以考試方式進行。以小學一年級生而論，倘屬富家子弟，其多已受幼稚班之訓導，故其獲得取錄之機會亦較高；而貧乏家庭之兒女，則希望較少，故頗有未盡公平之嫌。且初進學校之兒童，其未來之成就，胥關乎其天分之發展程度，即一切客觀條件之能否配合而定。貧乏家庭之兒童得入學後，倘能獲一切客觀條件之配合，則其將來之成就，亦有同等機會。」因此，錄取新生時，除考慮基本因素外，還考慮申請人是否孤兒、是否特別貧困等（《星島日報》，1955年4月8日）。雖然上文提到報紙作為歷史資料的價值，但是，由於報紙的取材視乎其新聞性，未必從頭到尾跟進某件事件。我們沒有找到關於這措施的實行及其成效的報導，不過政府在開始發展普及教育的同時，宣佈均等機會的立場，在今天看來是有歷史意義的。

學生的精神面貌

目前香港流行一種看法，認為今天的兒童生於安樂，好逸惡勞；相比之下，昔日的學生都是刻苦、上進及成熟的。這觀點有一定的根據。過去的報刊資料的確有很多關於學生逆境自強的報導。不過，這個假設流於簡單化，對以前和現在的學生都不公平。今天的年輕人之中有部分也是刻苦努力的，正如往日的學生也有輕佻浮誇之輩。報章資料便呈現出當時學生的種種行為問題，打破了這種美化過去的定型。下面僅舉兩個例子。

一部分中學生「流氓」，決不肯耗費一些時光來讀書。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湊幾個人在馬路上站著或散步，用和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的嗓子，談些追女生的事情，或者打架的經過，談話之間，每個人都是標準羅賓漢，即都有異性愛，又都是天下無敵的好漢。倘若有一個女性經過他們身旁，他們就目迎目送，然後一齊喊一聲：「勁啊！」倘若有人碰撞了他們其中的一個，那他們就要一擁而上，先罵後打，打完了大家一起逃。（《公教報》，1941年2月1日）

當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些學生朝夕流連到舞學院去，樂不思蜀……記者曾向一些中下級的舞學院去調查，當事人為著誇耀他們的生意之暢旺和學院內有「索野」，他們承認該舞學院內有真正的雙料男學生，也有真正的女學生而兼女教授。他們一方面是中學生，一方面是舞學院的學生。他們來的時候，大都是聯群結隊而至，並且是放學和入夜的時間，週末和星期假日學生人數更多……。何以要上那些小舞院呢？……。這是「過癮問題」……。在師長或家長之間，總不免有所顧慮，那像得那些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來得有趣呢？（《星島日報》，1955年2月8日）

上述的情況應該屬於極少數。由於民生困頓、民風純樸，大部分學生還是有憂患意識及奮鬥精神的。報章反映的更多是當時的窮人子女怎樣克服困難，爭取上學的機會，希望獲得知識並改善自己及家人的處境。

結語

以上我們透過對中文報章資料的分析，探討了1930-1950年代香港教育量的發展、公私營學校的消長、質的改善、教育機會與甄選、學生的精神面貌等方面的情況，揭示了許多不為官方資料所反映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相信對更清晰地瞭解早期香港教育發展的來龍去脈，有著積極的作用。可以說，民間的中文的資料，是全面認識香港教育發展的重要資料。它們即時、生動地捕捉了當時社會不同人士對教育的看法，展示了多元化的香港民間對政府教育政策的回應，與官方的英文的資料互補不足。2009年香港將會實施新的3+3+4學制，高中教育將會真正普及。也就是說，這次改制實際上把「基礎教育」的涵義從初中延伸到高中程度。鑑往知今，人們可以從中悟出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並展望其前景。

註釋

1. 嚴格來說，如Barraclough所言，「事實」不一定是「真相」，而是一連串「被接受的判斷」(accepted judgments)(見Carr, 1961, p. 8)。
2. 過去在歐美，基礎教育一般等同全民教育，含義是正面的；在殖民地則指殖民政府辦的僅能有限應付當地需要的教育，帶有貶義。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鼓勵新興國家發展教育，給予「基礎教育」新的涵義。1970年代，聯合國的國際勞工組織推動保障「基本需要」運動，包括食物、健康、技能與知識等，「基礎教育」等同小學教育(Husen & Postlethwaite, 1994, pp. 465-475)。
3. 香港最早的本地中學會考，始於1937年，雖然名為香港中學畢業會考，但對象卻僅為英文中學的畢業生。1952年首次舉辦香港中文中學高中畢業會考。1974年，兩個中學會考合併為香港中學會考(方駿、熊賢君，2008)。

參考文獻

- 《工商日報》(1946年6月18日)。〈為數萬失學兒童計 全港學校聯合入呈港督〉。
- 《大公報》(1953年6月3日)。〈官立小學名額有限 如有空額才能入學〉。
- 《文匯報》(1949年11月2日)。〈長洲魚校護校成功 當局應允不予改組〉。
- 《文匯報》(1953年8月23日)。〈勞校和失學的勞工子弟〉。
- 《文匯報》(1954年4月23日)。〈勞校學生與麵包〉。
- 《公教報》(1941年2月1日)。〈給公教中學生的信〉。
- 方美賢(1975)。《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香港：中國學社。
- 方駿、熊賢君主編(2008)。《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
-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2006)。《香港早期報刊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齊樂(1996)。《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
- 阮柔(1948)。《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 李志剛(1992)。《香港教會掌故》。香港：三聯書店。
- 《南華日報》(1939年4月27日)。〈香港教育雜寫〉。
- 《星島日報》(1948年1月20日)。〈做成學校的紊亂和不安 按月收學費有弊害〉。
- 《星島日報》(1948年8月14日)。〈四十二天暑假 學校嫌太久〉。
- 《星島日報》(1949年6月20日)。〈漁民辦學過程艱苦 只為要子弟有書讀〉。
- 《星島日報》(1949年7月2日)。〈學校不足失學者多 教育當局放寬限制〉。
- 《星島日報》(1949年12月15日)。〈徵收學費辦法 僑校校長集議決定 八月份學費將退還〉。
- 《星島日報》(1951年6月16日)。〈官立學校決秋季改制 中小學均六年畢業〉。
- 《星島日報》(1951年6月21日)。〈中小學校改制〉。
- 《星島日報》(1952年8月18日)。〈英文小學萬人投考 招新生額僅四百名〉。
- 《星島日報》(1953年8月10日)。〈教育則例嚴限課室容額 港九私校瀕臨困境〉。
- 《星島日報》(1955年2月8日)。〈只顧在舞校上夜課 學生期考成績頓差〉。
- 《星島日報》(1955年2月11日)。〈港督在元朗中學頒獎禮致詞 農村小學生畢業後應受訓成良好農民〉。
- 《星島日報》(1955年4月8日)。〈官立小學取錄新生 報名者已逾三萬人〉。
- 《星島日報》(1955年8月16日)。〈推行平均發展教育 學校課程將增科目並提倡新課外活動〉。
- 《星島晚報》(1949年2月17日)。〈「學店」的內幕〉。
- 《星島晚報》(1949年7月8日)。〈走鬼學校形形色色〉。
- 《星島晚報》(1955年3月25日)。〈去年三十一私校結業 新建學校四十五間〉。
- 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 陳謙(1992)。《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
- 張慧真、孔強生(2005)。《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華商報》(1947年1月11日)。〈百萬人口的都市 中小學校五四七間 學生只有九萬餘人〉。
- 《華僑日報》(1949年6月10日)。〈各區勞工子弟學校八月吊銷執照〉。
- 《華僑日報》1950年4月24日。〈由失學說到官校增費〉。

- 《華僑日報》(1951年1月18-20日)。〈從三個重點看香港的教育〉。
- 《華僑日報》(1951年6月11日)。〈實施Form制 官立英文學校學生 畢業期限縮短兩年〉。
- 魯言(1979)。《香港掌故》(第二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蔡寶瓊、江瓊珠(1998)。《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 譚萬均(2000)。〈香港的私立學校〉。載顧明遠、杜祖貽(主編)，《香港教育的過去與未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Bickley, G.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41-1897: As revealed by the early education report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Proverse.
- Carr, E. H. (1961).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Eitel, E. J. (1890-1891).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XIX (5), 308-24; XIX (6), 335-368.
- Guthrie, J. W. (2003).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 6*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 Hinton, A. (2004). *Only a teach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9). *Administrative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5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51-5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usen, T., & Postlethwaite, T. N. (1994).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nd ed.). Oxford: Pergamon;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2000).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1925-2000*. Hong Kong: Author.
- Queen's College. (1992). *The yellow dragon: Queens' College,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 Stanford, M. (1986).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 Sweeting, A. (1990).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weeting, A. (2004).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200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ymons, C. J. (1996). *Looking at the stars: Memoirs of Catherine Joyce Symons*. Hong Kong: Pegasus Books.
- Thompson, P. (197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sh, J. (2002). *The pursuit of history*.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 Yu, B. (1999). *The arches of the yea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Bas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s Revealed in the Chinese Press, 1930s–1950s

Grace C. L. MAK and Jun FANG

Abstract

In the past, researchers tended to rely heavily on official document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ough official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they constitute only one of numerous sources of evidence and give only one persp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addition, official documents, written in English only in pre-1974 Hong Kong, essentially reflect the interests and viewpoints of those that operate in that langu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1930s to 1950s from an unofficial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levant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s published in that period, it discusses the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quality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selection, as well as student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Hong Kong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thinking and doing of a wide spectrum of Hong Kong society little reflected in viewpoints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helps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at period in Hong Kong.

麥肖玲，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首席講師。
方駿，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系主任。

聯絡電郵：gmak@ied.edu.hk